

英国的中东外交及其结果剖析(1914—1923)

王三义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 大英帝国在近代外交史上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英国对中东阿拉伯诸行省的安排,既给阿拉伯人许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和“统一”,又给犹太人允诺,支持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同时允许法国人得到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与法国共同受国际联盟“委托”统治阿拉伯地区。而英国的真实意图则是如何建立自己在中东的持久控制,既不想让犹太人建国,也不想让阿拉伯地区统一,还不想让法国人过多染指。事实上犹太人、阿拉伯人看到希望却得不到实利;法国表面上与英国平起平坐,实则受到英国支配。最终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陷入失控状态,以不体面的方式收场。

关键词: 英国; 中东外交; 结果; 剖析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07)06-0084-04

大英帝国有海军、殖民地、贸易三大优势做后盾,在外交场上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从出兵中东(1914年)、英法“协定”(1915年)到委任统治(1922年),前后几年时间,英国费尽心机,酝酿方案、出台政策、选派官员、安抚各方(主要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左顾右盼”(与法、俄、美等国周旋),终于受国际联盟“委任”,堂而皇之地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期间的外交策划和实施极为玄妙,值得深入研究和仔细玩味。

一、英国的占领与“两种诺言”

(一)英国对阿拉伯行省的占领。一战爆发不久,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0月正式参战。为保卫英国通往印度的运输线,防止波斯石油资源被敌方控制,英国很快出兵两河流域。11月6日,从印度调来的英国舰队驶至波斯湾,炮轰法奥,英国军队在阿巴丹登陆,于11月22日攻占了巴士拉,12月占领古尔纳。到1915年5—6月间,英军占领阿马拉和纳西利亚;10月,英军先头部队进抵阿济济亚,遇到抵抗被迫后撤至库特。这支9250人的英军部队于1916年4月向奥斯曼军队投降。受挫之后的英军于1916年12月恢复军事行动,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此后英国继续北上,直至1918年10月彻底占领基尔库克。10月30日《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生效,11月7日,驻守摩苏尔的守军撤离,英军进驻摩苏尔。[1](P172)英国再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人,用一支军队守卫着从摩苏尔到波斯湾的土地。

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英国在战争初期就与汉志的实力派人物谢里夫·侯赛因接触,表示愿意支持侯赛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王国。英国驻开罗的高级官员麦克马洪在与侯赛因的通信(后文详述)中,专门协商了相关问题。侯赛因相信了英国人的许诺。1916年6月侯赛因的儿子阿里和费萨尔在麦地那起义,驱逐了汉志的奥斯曼军队。随后,费萨尔挥师北上,进入叙利亚,配合英军攻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1917年12月,英军攻陷耶路撒冷。在法国策应下,英军沿地中海东海岸北进,夺取了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在约旦河东岸,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同艾伦比率领的英军配合作战。1918年10月,阿拉伯军队和英国军队同时进入大马士革。根据《摩德洛斯协定》条款,奥斯曼土耳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阿西尔、也门的行政当局被废止,从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400多年的统治。到巴黎和会召开(1919年1月)时,艾伦比统率的英军控制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大部分地区,肥沃新月地带的命运由占领军掌握。“整个中东,除了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包括在内,其余都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经济附属物。”[2](P484—485)法国则坚持要在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南部享有控制权,希望得到或至少可以控制海峡区域。阿拉伯军队解放了南起西奈半岛、北至托鲁斯边界的叙利亚,并解放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但按照军事法令,这些地区由英国最高统帅控制。

收稿日期: 2007-05-15

作者简介: 王三义(1968—),男,甘肃清水人,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站博士后。

(二)给阿拉伯人的诺言。阿拉伯人特别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担心英、法、德殖民主义者趁机从中渔利,影响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一战初期尚未完全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立面。当时阿拉伯人的处境极为困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英法控制着埃及、苏丹、北非、阿拉伯半岛边境。英、法唯恐阿拉伯地区落入德、土一方,便竭力拉拢阿拉伯人,承诺在战后给予独立自主。[3](P528—529)

1915年7月,谢里夫·侯赛因写信给英国驻埃及—苏丹的高级专员麦克马洪,提出独立条件。此前,侯赛因与英国官员秘密谈判,英国许诺战后建立“阿拉伯帝国”。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时代会”及“阿拉伯青年会”一致提出的合作条件是:英国承认阿拉伯建立一个版图包括北至托鲁斯、南至阿拉伯海的独立王国,取消外国的一切特权。麦克马洪到1915年底才给侯赛因答复,表示基本同意,但仍保留英国在一些地区的特权,特别是伊拉克南部。英国认为,那里是英国切身利益所在,不能轻易让步。麦克马洪还认为,叙利亚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带以及亚历山大勒塔,并非纯粹阿拉伯地区,而且牵涉到法国的重大利益,所以采取保留态度。侯赛因主张伊拉克南部问题战后再谈;对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某些土耳其人居住区,侯赛因作了让步。至于大马士革省西海岸地区,侯赛因坚持不能交给法国。最后,英国尊重阿拉伯民族的“自由”,侯赛因同意向土耳其人宣战,阿拉伯的一切资源都供协约国使用。于是侯赛因号召全体穆斯林起来参加反对土耳其的“圣战”,费萨尔率兵进入亚喀巴,为英国人从埃及出兵叙利亚提供了有利条件。费萨尔策动叙利亚人反土耳其,并宣称根据《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协约国的目标与阿拉伯独立的目标是一致的,协约国的胜利将保证阿拉伯统一独立的实现。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统治区的占领,以及切断交通线、阻止德、土军队南进的行动,给德、土盟军造成困难,使英国军队得以于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称这一重大措施为“阿拉伯大革命”[3](P530—531)。

英国口头上大谈中东人民的幸福和期望,实际上置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英国最初的想法还是对肥沃新月地带¹的军事占领,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建立殖民统治,后来的形势表明英国吞并肥沃新月地带不可能,但英国根本就不准备实现对侯赛因的承诺。汉志王国在1916年6月起就成为交战国,费萨尔率领他的军队进入大马士革时(1918.10.30),成立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的愿望似乎要实现了,后来才发现,英国的许诺根本靠不住。1919年费萨尔代表他父亲侯赛因国王,也代表阿拉伯人赴巴黎参加和会,但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没讨论阿拉伯独立问题。侯赛因自己宣布为阿拉伯国王,英国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英国实际并不赞同阿拉伯人独立。

(三)对犹太人的诺言。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对英国非常重要,如果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不仅能从侧翼确保苏伊士运河安全,而且还将埃及、波斯湾和印度等英国的东方殖民地连成一片。法国想利用其与叙利亚等地的传统联系,趁奥斯曼帝国衰败之际把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纳入

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法提供夺取巴勒斯坦等地的理由。1916年劳合·乔治内阁决定加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从埃及主动向奥斯曼帝国发起进攻,夺取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极力主张攫取巴勒斯坦,他通过英国驻法大使转告法国,英国要控制中东并保持自己的军事存在(后来在巴黎和会上,他拒绝承认法国在战后中东的地位,贬低《赛克斯—皮克协定》的重要性,反对《协定》中对巴勒斯坦的分割)。[4](P267)同时,劳合·乔治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上议事日程。

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求之不得,因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塞尔大会20年之后首次得到一个国家的正式支持。[5](P80)1917年12月,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此后,巴勒斯坦由英国控制和占有。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允诺,是英国取得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而占有巴勒斯坦后,英国的埃及属地和印度殖民地从此连成一片。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连接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6](P133—142)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宣言的发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感到建国的希望就在眼前。

二、英法之间的妥协与中东计划的最后落实

法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所有列强中,法国向这里资本输出最多,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债主。当然也有政治利益,如法国支持基督教徒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斯坦布尔的活动开展得很早。[7](P141—142)法国与英国相同的利益是联合抵制俄国的瓜分计划,所以19世纪一直主张“保持土耳其现状”,但法国企图控制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南部。一战期间,协约国签订了四个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做准备的“秘密协定”,其中最关键的是1916年4月由英国外交官塞克斯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皮克及俄国代表协商签订的《塞克斯——皮克协定》。[8](P621—622)其主要内容包括:叙利亚西部、包括黎巴嫩等地划为法国的直辖领地;伊拉克南部、巴勒斯坦的海法港和阿克港划为英国的直辖领地;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叙利亚东部和摩苏尔省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中部地区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法两国在各自的直辖领地内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在势力范围将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英法两国不在阿拉伯半岛取得属地,不允许第三国取得属地和在红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9](P268)

后来的研究发现,英国在1919年没有在中东成立军政府或军事占领的可行的计划和设想。驻中东的英国军队是战时组建的,大多数士兵急于复员回国,新派到中东的军官们也没有长住中东的信心。1919年的最后几个月,英国驻扎

¹ 范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地区,因该地区形似弯月而得名(英文名:the Fertile Crescent areas)。

在贝鲁特和黎巴嫩沿海的分遣队被法国部队所替换。根据在巴黎所订的协议,法国古罗将军成为协约国驻叙利亚的行政长官。此时耶路撒冷和雅法出现反犹太人的暴动,巴格达的局势变得日益紧张。1920年3月,叙利亚大国民会议宣布叙利亚独立,建立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独立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推举费萨尔为国王。恰在这年的4月24日,英、法、俄在圣雷莫(意大利境内)订立协议,就摩苏尔石油特许权和输油管问题、委任统治问题、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采取行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确立了英国和法国划分肥沃新月地带的基本框架: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由英委任统治。[10](P434)《圣雷莫协议》使英法在中东的长期争夺画上一个句号。

一战的硝烟散尽以后,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宰的国际联盟决定建立委任统治制度。所有委任统治地被划分为A、B、C三类,这一新制度用国联盟约第22条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在内)、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分为A类委任统治地区。根据国联盟约规定,A类委任统治地可以暂为独立国,但在行政管理方面须由受委任国予以指导和援助。殖民列强用委任统治制度作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幌子,标榜其宗旨为“保障该地居民和平、秩序和良好管理”。1920年7月1日,英国第一任高级专员在巴勒斯坦就职,英国的委任统治从此开始。1922年7月,国际联盟委员会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后来的学者认为,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订,“把阿拉伯地区从土耳其分出去”才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此前土耳其并未同意把阿拉伯各行省分离出去,所以委任统治不能生效。[11](P90)可见英国实际的委任统治比条约生效提前了三年多时间。1920年8月10日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宣布:叙利亚(包括亚历山大勒塔、阿勒颇、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城市)划给法国,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地;摩苏尔省并入巴格达和巴士拉,组成伊拉克国,受英国监督;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两岸土地,并延伸至亚喀巴湾)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并将《贝尔福宣言》写入委任书中;英国人获得经过叙利亚的输油管铺设权,法国则可以用武力自由处置费萨尔及叙利亚王国。[2](P489)

在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对巴勒斯坦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但协约国最高级会议没有让人口占巴勒斯坦90%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参加,也没有就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条款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1](P89)1920年英法之间的圣雷莫协定,几乎是出卖阿拉伯人。1920年伊拉克爆发了反对英国占领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尤其是迫使英国考虑新的殖民方式。1920年10月,珀西·考克斯调任伊拉克民政专员。考克斯极力笼络伊拉克保守的封建主阶层,成立了临时国务会议,设立主席一人,主管内政,各部和各省均设有英国顾问。国务会议以巴格达市纳吉布家族的阿布杜勒·拉赫曼·盖拉尼为首,各部部长主要是旧官僚、旧议员、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以逊尼派为主。[1](P177)

英国决定给予伊拉克形式上的独立,建立听命于英国当局的阿拉伯人政府。1921年8月23日,巴格达举行了费萨尔加冕仪式,现代伊拉克的第一个王朝(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哈希姆王朝诞生了。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由1917年开始的直接殖民统治转变为委任统治方式。

1921年2月,阿卜杜拉率领一支阿拉伯军队进驻马安,后推进到安曼。英国已决定单独建立外约旦国家(外约旦即约旦河东岸地区,本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4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殖民大臣丘吉尔同意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国王。9月,英国的决定得到国际联盟同意,并决定不让外约旦承担为巴勒斯坦规定的许多委任统治条款的义务,特别是关于圣所和贝尔福宣言的那些条款。1923年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宣布外约旦独立。中东的版图上第一次出现外约旦这样一个阿拉伯国家。

那么,英国是如何安抚犹太人的呢?对犹太人而言,有了《贝尔福宣言》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犹太大量移民,立即和当地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英国起初的确有同情和偏袒犹太人的倾向,如英国允许犹太人挂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旗帜,但禁止阿拉伯人的组织悬挂自己的国旗。[12](P105-106)不久巴勒斯坦的英国官员发现,犹太复国主义为建国所作的努力威胁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利益, [12](P106)于是英国限制犹太移民。1922年的《丘吉尔白皮书》明确提出:如果犹太移民影响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乃至停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十七年后(即1939年),英国政府发表《麦克唐纳白皮书》,修正了《贝尔福宣言》,实际上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三、英国中东外交的“障眼法”及其本质

表面上看,英国的中东政策不断地变动和调整,实际上,英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和本质始终没有变化。在伊拉克,英国的控制遇到的阻力虽大(如1920年阿拉伯人起义、1941年的政变),但英国当局奉行的是一贯的立场和原则。在巴勒斯坦,英国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保持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使巴勒斯坦成为实现英国在中东政治经济利益的基石。

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花样翻新,只是使用障眼法。所谓支持阿拉伯人独立,是为了换得阿拉伯人在战时站在自己一方。《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许诺只是外交手段,英国根本没打算兑现。英国不支持侯赛因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是因为阿拉伯的统一将使英国失去在中东的既得利益。所谓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为了在战争结束后单独控制巴勒斯坦找理由,抛出《贝尔福宣言》,含有明显的排斥法、俄、美的意图;委任统治期间,英国又限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是因为犹太人的行动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利益。英国始终奉行这样一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游移政策。所谓与法国共同“管理”阿拉伯世界,只是调和了利益冲突,是“有条件”妥协的产物。英国虽把叙利亚交给法国委任统治,但划出了约旦河东岸土地,成立受英国支配的外约旦王国,保证了英国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输油管的畅通,也把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和阿拉伯半岛的汉志政权分割开来。

如果抛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利益不谈,单从外交技巧来说,英国在中东展露了三种外交手段,熟练地应付了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三方而不露痕迹,不可谓不高明。问题在于,英国手里的底牌只有一张而不是四张,不可能给三方各发一张,自己手里还剩余一张。犹太人要的不是空洞许诺,是要在英国支持下建立犹太国家;阿拉伯人早已得到了英国许诺,极力要求英国兑现诺言,给阿拉伯人独立和主权。法国也争夺对巴勒斯坦的支配权(接受不包括巴勒斯坦的叙利亚,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法国也不需要空洞诺言。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法国人之间的争夺,不是简单的或局部的利益之争,而是政治权力之争,是“由谁主宰巴勒斯坦”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毫无妥协余地。

英国给犹太人、阿拉伯人两种无法兑现的诺言,同时与法国共同受国际联盟“委托”统治阿拉伯地区。这就仿佛英国转动一个“陀螺”,陀螺的上端放置不同颜色的糖果,让犹太人、阿拉伯人看到自己要的糖果,但没法抓到手;英国把“陀螺”交给法国转动,法国人却操纵不了、玩不转,只得乖乖交给英国人操作。《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塞克斯——皮克协定》和《贝尔福宣言》是一连串的障眼法。犹太人、阿拉伯人看到希望,但拿不到实惠;法国表面上与英国平起平坐,实则受到英国支配。历史证明,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相比,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尤其是巴勒斯坦,最后连犹太人的枪口也对准了英国人,英国被迫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当然,英国的中东外交不断变花样,是客观条件和国际形势所迫,并非英国政治家们乐意为之。从自身实力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英帝国与大战爆发时的英国不可相提并论,战后英国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没有战前的底气;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的崛起和威尔逊总统自由主义的影响,已经使英国所谓的外交优势黯然失色,而法国紧紧咬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让英国处处被动。从1914年到1918年,英国考虑的是否并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等地,可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吞并伊拉克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转而考虑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1923年之后英国又一次修改其外交策略,由委任统治名义下的“实际控制”转变为“咨询和指导”(到1927年再转变为“尽量减轻对伊拉克等地的国际性责

任,筹划建立半独立政府)[13](P144—145)。英国试图保持甚至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利益,但又力不从心,难以从谈判桌上得到的东西,就转向阿拉伯人和急于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给双方许愿以换得支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追求的是各自的政治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平心而论,英国并非有意作伪,其良苦用心,实则迫于形势。

参考文献:

- [1]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2] 费希尔. 中东史(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3] 纳忠. 阿拉伯通史(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4]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9.
- [5] 肖宪. 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6] Jill Hamilton, God, Guns and Israel: British,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Jews in the Holy Land. Sutton Publishing Gloucestershire, 2004
- [7]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M]. London, 1996.
-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M].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 1988
- [9] 王绳祖主编. 国际关系史(上)[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 [10] William Ochsenwald,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2004
- [11] 杨辉.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12]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fifth ed. Boston, New York, 2004
- [13] Nadine Mouchy and Peter Sluglett, The British and French Mand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eiden, Boston, 2004

Analyses of the British Diplomatic Polic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1914—1923

WANG San-y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Britain has been successful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foreign affairs. Yet the British diplomatic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and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ad been too mysterious. The British has promised Arabians to obtain 'Independence and Unity,' and promised Jewish to help them 'found Home of Jews'; meanwhile consented Frenchman to rule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s its mandate regions, which was given authority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fact, The British not only had hardly any sincerity to meet Arabians demands or Jewish demands, but also did not permit French to take a share of the Middle East. "Corresponds between McMahon and Hussa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Agreement of Sykes—Picot" were a series of cover-ups, therefore Arabians, Jews and Frenchman could not gain real profits. However, this kind of conjuration is bound to be exposed in the end, for the British had lost control in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in Palestine.

Key words The Britain diplomacy of the Middle East; diplomatic consequences; analyses